

我国民俗学教育与研究的现状及思考

——以高校为主要考察对象

■万建中

近 20 多年,中国民俗学取得长足发展。但就当前民俗学学科而言,高校民俗学学科点的不足,学界对民俗学学科认识的偏差,严重制约了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和兴旺。民俗学课程和毕业生的自产自销,导致了令人悲哀的“自娱自乐”的困境。进行民俗文化教育,可以让大学生接受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是思想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经济大潮汹涌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高校;民俗学;教育;学科;现状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5)05-0007-07

万建中(1961—),男,江西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始于高校校园,具体说是以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发起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为标识的,人们对此已达成共识。当时任教北京大学的刘半农(1891~1934)、沈尹默(1883~1971)提倡写新诗,倡导从民歌民谣中发掘文化艺术的理想因素。这场开风气的歌谣学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旗帜鲜明的提出学术研究主张,吸引了众多学人的目光。胡适、顾颉刚、董作宾、朱自清、钟敬文等学者都积极投身其中,出版歌谣周刊 96 期,搜集的歌谣达 13000 余首,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同时期还出版了不少开创性甚至是经典性的学术成果,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董作宾的歌谣研究,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我国民俗学教育与研究已走过了近 90 年的历程,相对高校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而

言,历史应该还是比较悠久的。可从全国民俗学学科的整体情况看,至今民俗学仍被视为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发展似乎是刚刚起步,大学民俗学教育体系仍未建立起来,绝大多数课程没有公开出版的教材。而稍微有点历史的文科诸多学科,课程、教材和教师队伍都已进行了多轮更新。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值得我们作些思考。

一、回眸近二十多年中国民俗学的发展

新时期的中国民俗学应该是从 1979 年开始的,以 7 教授提出《关于建立民俗学会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为标志。近二十多年,中国民俗学研究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一是延续了早期民俗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即执著的人类学情结。

人类学研究的许多内容,实际上与民俗学

是重合的,国外的人类学家有些同样也是民俗学家。民俗实际上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民众行为、民众的观念、民众的组织形式、民众对生活的看法、民众的知识,民俗学与人类学交叉重叠的地方就在这里。对此,钟敬文先生有明确的表述:“人类学(这里主要指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姊妹学科,它们所处理的文化对象,主要是人类集体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它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所处理的对象大部分是共同的或密切相联的。因此,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理论的探索、阐发等方面,都有互相汇通和互相借鉴、启发等作用。作为一种应用科学,彼此在学理上往往也是相通的。”^[1]人类学与民俗学之所以有一种亲缘关系,两门学科研究对象有交叉,这个交叉的本身就规定了两个学科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人类学调查和探讨人们的行为表现、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状态,其研究方法都可以为民俗学所运用。实际上,民俗学的研究是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我们现在之所以把人类学和民俗学联系起来,来探讨它们的亲缘关系,就是从中国现在的研究现状看,有很多人的研究是跨学科的,而且,现在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很多为民俗学所采用。人类学原来运用的方法、研究对象,有些恰恰是民俗学所忽视掉的,现在借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正好可以弥补民俗学研究中原有的不足与空缺。

许多研究方法,两个学科都是共用的,比如说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象征人类学方法以及解释人类学方法等等。按照某些美国人类学者的分类,民俗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学科分支,或者说也可以说彼此是姊妹学科。人类学和民俗学从其研究对象来说有一种交叉的关系。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的活动的,人的存在环境,人的行为方式,人类所创造和享用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民俗学实际上也是如此。过去似乎有一种误解,认为民俗学研究的是

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是民间文化现象,实际上所研究的这种现象本身也是以人为主体的,是特定众的一种群体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生活状态。在研究对象上人类学和民俗学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包括研究方法,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作业,这一研究方法是相通的。文化人类学强调理解,理解当地人对自己生活现象的看法,民俗学的立足点也在这一点上,这也是相通的。所以钟敬文先生指导的一些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村落社会组织建构、村落族群的社会关系,现在出版的一些关于某一区域人们生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的专著,也是民俗学者写的。研究某一村落的文化现象,村落史的研究,村落各类组织的研究,实际上都是民俗学家来做的,他们运用的也主要是人类学的方法。

我们不能把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只是停止在揭示文化遗留物的层面。当然这也是一种研究。现在我们民俗学研究领域也不只是局限在一些边远的、落后的山区,它也在研究城市社区,研究社区人们的生活创造和文化创造。研究这些民俗,若不借用人类学的方法是很难进行的。在文化人类学故事学领域,参与研究的学者众多,他们依循人类学研究的路子,直接从民众中搜集第一手材料,强调正在流传的故事材料的重要意义,并将文献材料和“田野”材料进行比较处理,经过分类分析,揭示故事的历史根源、文化意蕴、社会功能和结构范式。

第二个特点是以丰硕的成果和多样的研究方法,展示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科的实绩。在文献民俗志采录方面,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协三部委组织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编撰工作。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口头故事文字化书面化的运动,被称为建设中国民间文化的万里长城,是有史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民间文化宝藏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搜集采录工作,为此制定了“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三性原则。截至1990年,

共搜集歌谣 320 万首,民间故事 183 万篇,谚语 784 万条,总字数达 40 亿,这件功在千秋的伟业既保存了民间文化又为日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奠定基础。

上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民俗学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时,文化界、思想界的气氛异常活跃,国外新理论、新方法被大量引入并得到适时借鉴;持续多年的“文化热”达到了一种顶峰状态,钟敬文先生也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俗文化学”理论观点;诸多民俗志工作的广泛展开,既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丰富的新资料,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这种良好的大的学术氛围和形势,必然影响到民俗学的研究,促使民俗学的研究要打破单一的、封闭式的和狭窄的局面,追求理论和方法上的多元化、开放性。

这一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空前活跃,成果显著。仅以民间文学理论著作为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有钟敬文的《民间文学概论》、张紫晨的《民间文艺学原理》、段宝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叶春生的《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朱宜初的《民族民间文学散论》、李惠芳的《中国民间文学》、刘守华、巫瑞书主编的《民间文学导论》等十余种;关于民间文学体裁建设方面,有袁珂的《神话论文集》、潜明兹的《神话学的历程》、刘城淮的《中国上古神话》、刘守华的《故事学纲要》、《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天鹰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程蔷的《中国民间传说》、贺学君的《中国四大传说》、吴超的《中国民歌》、潜明兹的《史诗探幽》、张紫晨的《中国民间小戏》等几十种著作。这些著作,在高校民俗学教育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促进了高校民俗学教育。此外,还有许多围绕民间文学中的某个专题进行研究、对民族或地区的民间文学进行整体研究、对民间文学进行跨学科研究、作家与民间文学关系、民族及民间文学史的著作上百部。这一时期国外的关于

民间文学的理论如神话学派、流传学派、历史地理学派、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故事形态学等都被介绍进来,并运用到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以民间故事研究为例,有运用故事类型索引和历史地理学派探寻故事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间的流传变异的,也有运用人类学、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理论阐释故事母题的文化意蕴和民族文化心理,还有运用叙述学和形态学理论对故事的叙述方式和内在结构进行研究的,再有将文献、口头文本和考古结合运用“三重论证法”进行故事研究的。另外学人不在单纯从文本进行故事研究,开始关注故事的生存情境,对故事讲述家和故事村进行研究。民间文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二、学科点最少的二级学科之一

上世纪整个 80 年代,是中国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恢复和大发展的时期,高校民俗学教育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钟敬文先生对此比较满意,他在 1989 年总结道:“十年来,在许多大学的文科院、系里,相继开设了民俗学方面的讲座。那里所讲授的,多数是一般民俗学(“民俗文化概论”),但也有的是特殊民俗学(如“敦煌民俗学”、“文艺民俗学”或“民俗学史”等)。这种课目的开设,不但对大量的青年学生传布了民俗学的知识和培养了他们这方面的兴趣,同时也促进和加强了这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资料搜集、整理工作。这是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条件。”^[2]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许多高校在注重民俗学课程的开设和师资队伍组建的同时,没有规划民俗学学科点的建立,更没有发展硕士点甚至博士点的长远打算。那时,除了北京师范大学以外,其他高校的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几乎都不是独立的学科,均靠挂于其他学科点。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是1988年原国家教委批准的高校重点学科。由于学科在建设过程中实际上拓展为包含中国民间文学在内的民俗学,而且已被现行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所确认,因而本学科点的名称亦应改作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了新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专业目录》。中国民间文学专业正式更名为民俗学,并成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和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并列,同属于一级学科社会学。从此,民俗学学科在我国高校有了名正言顺的地位。

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是我国这一学科的带头人,他一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早在1949年,他率先将民间文学带入新中国大学课堂,1953年起招收这一专业方向的研究生,1955年创立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改革开放以后,本学科进入了更快发展的新阶段,1981年被定为第一批博士点,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对全国高校同行进一步起到积极的影响和示范作用,至1996年成为“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为发展和运用民俗学,加强对我国民众生活与传承文化的科学研究,1993年建立了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2000年研究所联合其他学科成立“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并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所编写的《民俗学概论》、《中国民俗史》、《民间文学概论》等是全国高校普遍采用的教材,1996年以来出版了“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等30余种专著或论文集,目前正抓紧进行《中国民俗史》等重要著作的编写。这些是学科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

由于钟敬文先生立足于北师大,在他的带领下,该校的民俗学专业长期以来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2003年以前,是国内高校民俗学专业惟一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这种一枝独秀的局面使得北师大培养民俗学博士的任务过于

沉重,生产出来的博士数量毕竟有限。除去留校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民俗学专业博士,剩下的已寥寥无几,难于满足其他高校建设民俗学学科点的需求。如今,也只有北师大、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大和华中师大等少数高校能够培养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博士,能够招收民俗学硕士的高校同样为数不多,屈指可数。由于积重难返,高学历的民俗学人才匮乏,具备增设民俗学学科点条件的高校几乎阙如。许多高校民俗学硕士学科点的教师,不是“科班”出身,他们原本是从事其他学科研究与教学的,由于热爱民俗学才转行的。全国大部分省份没有民俗学学科点,这种情况同与民俗学关系密切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就所有文科的二级学科而言,这种情况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

目前,国内一些著名的高校,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等,不仅没有民俗学学科点,而且也没有开设民俗学方面的课程。有的高校民俗学学科点受到其他学科无情排斥,被边缘化,陷入苦苦挣扎的逆境。其中原因,除了客观因素以外,主要在于学术界对民俗学学科认识的偏见。在当下社会,“权力政治通过历史的文本化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经典’,进而排除了非主流的、民间的、边缘的历史与声音,那些被文字等现代传播媒介书写、刻录的历史也就充当了强化权力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即使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历史书写,也被整合到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内,因为民间文学的抵抗性质、狂欢特征,众多民间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作品,便再一次尘封在历史的背后。”^[3]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一些领导和学者更是对民俗学或多或少有片面的看法,认为民俗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粗俗”的、“浅陋”的、“下里巴人”的、没有社会功能的玩意。这是没有真正意识到民俗的审美价值、认识世界的价值和生活价值的结果。

在高校,没有民俗学学科点,没有这一学科的师资,不能开设民俗学课程,民俗学教育就无从谈起。

三、民俗学专业课程体系孤立而单一

Folk-lore 的原文是“民众的智慧、民众的知识”,到了19世纪70年代,这个术语被西欧学者广泛使用,并确定为“民俗学”的含义(即“关于民众智慧的科学”的意思)。在当时,它的概念显然是广义的,凡是民间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像村制、族制、婚姻、丧葬、孕育、社交、节日、信仰、祭仪、居住、饮食、服饰、农耕、技艺以及民间文艺、民间谚语等等,都属于民俗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在民俗学的发展过程中,随之又出现了 Folk-lore 的狭义的概念,即专指民间文学创作。“五四”时期,中国学者将这个名词解释成“民俗学”。同时又具体地译为“民间文学”,即专指“民俗学”当中口头艺术部分。“因此,folklore 也可被视做民间文学的同义语,人们在讨论民间文学时,不一定要严格地使用 folk literature (民间文学)或 popular literature(大众或流行文学)等短语特指。”^[4]

正是因由民俗学与民间文学难于分割的关系,各高校民俗学专业一直存在于中文系,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一部分。然而,汉语言文学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完全可以摒弃民俗学专业,也就是说,在观念和实际操作的层面,民俗学都没有真正融入汉语言文学教育框架之中。这大概是绝大多数综合性高校的中文系无意设立民俗学学科点的主要原因。即便有民俗学专业,譬如北京师范大学,在中文系本科生教学课程体系中,“民俗学概论”为选修课,反而“民间文学概论”属于“文学”类课程,为必修课。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文化社会学”、“民间文艺学导论”、“民俗学导论”、“中国民俗学史”、“宗教人类学”、“民间叙事学”、“民

俗学田野作业方法论”等,这些课程同样未能成为中文系其他二级学科专业教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代码中,民俗学是 030304,归为社会学,和汉语言文学不在同一系统。民俗学专业的学科在中文系,通常被视为特殊专业而被“特殊”对待。在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入学考试,为便于录取时各专业之间生源可以互相调剂,一般基础课考试试卷是通用的,惟独民俗学是单独进行。民俗学基础课考试科目为“社会学”,与其他专业风马牛不相及。其他专业研究生选修课程,专业之间互选的情况非常普遍,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则很少选修其他专业课程,所开课程一般也是“自产自销”。教学方面如此,科研方面同样难于摆脱孤立的命运,民俗学的教师很难进入汉语言文学学科梯队中,共同做某一课题。在申报课题时,民俗学专业的教师常因不能确定所报课题应该归属哪个学科而左右为难。

在教学内容和方法方面,民俗学教育比较单一,没有显现民俗学学科特色。一方面,一般的民俗生活知识被当作学术加以传授,学术话语的味道不甚浓郁。学术成果多为“事象”的解释,不足以支撑起民俗学课程的理论体系,直接导致民俗学课程理论的建构比较零碎,缺少可供思考和阐述的足够空间。正如乌丙安先生在《民俗学原理》一书的“后记”中所言:“在国际国内民俗学被人为地摆放在边缘或从属位置的漫长岁月中,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常常被打入另册,划分到‘其它’或‘杂家’之列。这除了学术传统中遗留下来的某些歧视性的习惯势力影响外,民俗学自身发展的许多局限和不足也把民俗学置于弱势学科地位而难以有强劲的开拓。”^[5]

另一方面,在大学课堂里,即便是讲民俗事象,也脱离了当地的文化传统,是在民俗事象之间兜圈子。民俗学教育也只能在教室里进行,学校一般不会拨给田野调查的专门经费。民俗是属于特定区域的,是各地不同的方言导致了民

俗发音世界的差异,同时,也使民俗完全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之中。民俗最突出的地域性表征就是方言,换句话说,方言让民俗涂上了鲜明的地域色彩,是“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最突出的表征。提及民俗学专业教师,即民俗工作者,其实是很郁闷的一群。他们研究的民俗,是一个展示的过程,一个已完成的事实。对这样一个过程,一个反复的事实,当地人习以为常,再熟悉不过,能够充分享受展示。但是,对于民俗学研究者来说,努力地田野作业,也只能了解此种过程之一二,获取一些相关民俗知识;能够用当地的方言在课堂里唱几句,便可招徕学生们的喝彩。离开当地之后,研究者们即利用同样是搜集起来的理论、方法和观点,对自以为是田野作业的成果进行分析和阐释。这一研究过程与当地的表演过程,可能已风马牛不相及矣。好在这种研究一般不是政府行为,不会影响当地人继续展示。

四、高校民俗学教育的需求和困境

高校民俗学教育一般局限于该专业内部,仅仅是学术层面的教育,并没有在整个校园普及开来。该学科的教师大多不具备宣扬民俗知识的使命,同时大多高校也不具备这方面的环境和条件。

钟敬文先生毕生致力于民俗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晚年在北师大,还多次给全校学生作了民俗学方面的讲座。他特别提出了在高校积极举办民俗学讲座的倡议:“为了扩大宣传范围和培养这方面的活动人才,有条件的大学(地方的与中央的)以及其它有关的学术机构,应该设法开设这方面的专题学术讲座。在这种讲座中,演讲者可以把关于这方面比较系统的知识扼要地传达给广大听众,而演讲者本人为讲好课,在准备时必然要加深学习和思考,从而也提高了自己这方面的学术水平。当然,这种讲座的

效果主要是在广大的听讲者方面。”^[6]他特别重视发挥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可以这样说,他毕生从事的不仅是民俗学专业教育与研究,更是民俗文化的大众教育。他说:“民间文学,在今天我们的眼里看来,不过是一种艺术作品。但是,在人类的初期或现在的野蛮人和文化国里的下层民众(后者例如我国的大部分的农民),它差不多是他们立身处世一切行为所取则的经典!一则神话,可以坚固全团体的协同心;一首歌谣,能唤起大部分人的美感;一句谚语,能阻止许多成员的犯罪行为。在文化未开或半开的民众当中,民间文学所尽的社会教育的功能,说来是使人惊异的。”^[7]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民俗文化同样是我们需要充分利用的教育资源。

应该来说,民俗学教育是能够推广起来的,因为每个学生都来自一个地方,或风俗圈,拥有自己的民俗知识。相对其他学科的普及教育,民俗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确,有的高校在开展民俗文化活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譬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社”。然而,从更大的范围而言,大学生热衷于科技竞赛、各种表演活动,对民俗知识并没有互相交流的欲望,对民俗话题并不很感兴趣。这同我国高校一贯重视政治思想教育是不相符的。如果将民俗学的田野作业纳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之中,肯定可以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丰富大学生们的民间生活知识。

其实,大学校园需要民俗学教育,因为民俗本身是人类群体对某一现象共同认可的心愿凝聚而成的。群体心愿的一致,形成了民俗特有的凝聚力,这凝聚力使民俗具有向心功能。民俗流传深广,群体凝聚组合力强,民俗向心力也大。我们平时所说的乡情、乡土、乡恋等等,实际上,就是同乡共俗人们之间习俗向心功能凝聚的产物。试想,一个人不了解自己家乡的民俗传统,如何生发对家乡的感情,一个不爱自己家乡的人,又如何爱自己的祖国。

从更高的层次说,民俗可以营造高校人文气氛,帮助大学生反观城市的生活形态。民俗作为人类文化意识中最底层的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对塑造大学生的人文性格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到了自由市场经济出现的时候,其带来的后果威胁了人类的幸福生活,解构了共同发展的社区。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由衷地会对那些质朴无‘文’的传统文化表示赞赏;它们引导人的经济动机和贪欲走向崇高,不允许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这样一来,在经济学家心目中那些非理性的传统事物(今天只有在不发达国家才能看到)恰恰成为研究人的合宜理论,成为我们时代疾患的诊断,成为走向未来的召唤。”^[8]但是尽管如此,民俗这一传统文化在大学教育中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状况不尽如人意,民俗学教育在大学校园几乎没有空间。大学校园仍被视为传播和接受精英思想的场所,大师们被顶礼膜拜,而民众和民间文化则被嗤之以鼻。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承担着培养优秀教师的重任,民俗学在教育学科里并没有位置。

在近10年高校学科建设中,经济学、工商管理科学以及其他应用性学科得到飞速发展,而传统人文学科则日趋萎缩,有些也只好另谋出路,增加一些应用性专业,诸如旅游、文秘、编辑、社区行政管理等“有用”的专业。训练与传授生产、操作、经营技能成为一些高校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全然不顾学生的人性和精神状态是否健康。这大概也是许多高校一直没有把民俗学学科建设纳入议事日程的主要原因。有学者在为人类学呼吁:“尽快改变完全缺少终极关怀的学科设置实用化、流俗化的弊端,及时把人类

学补充到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来,同时大力扶植和发展人文教育和人文学科。理由其实非常简单,人文这个词的词根在西文中也就是人性的意思!”^[9]人类学和民俗学同属于社会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民俗学在高校学科建设中在境遇肯定还不如人类学,这是民俗学的悲哀,更是高等教育的不足。

中国的历史渊源流长,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民俗教育资源极为丰富。民俗学肩负着弘扬民族民间文化传统的任务,同时,也具有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责任,是需要大力发展的学科。只要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予以重视,民俗学工作者们齐心协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民俗学一定能成为最有特色的世界性学科之一。

[参考文献]

- [1][2] 钟敬文. 关于当前民俗学工作的三点意见——致中国民俗学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的信[C]. 钟敬文文集. 民俗学卷[A].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468, 93.
- [3] 刘晓春. 当下民谣的意识形态[J]. 新东方, 2002, (4).
- [4] 祁连休, 程蔷. 中华民间文学史[M].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前言”8.
- [5] 乌丙安. 民俗学原理[M].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1. 330.
- [6] 钟敬文. 钟敬文文集. 民俗学卷[M].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269.
- [7] 钟敬文. 民间文学和民众教育[J]. 《民众教育》季刊, 1933. 第2卷第1号.
- [8] 艾伦·布鲁姆. 缪青等译.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388-389.
- [9] 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戈. 人类学关键词[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74.

【责任编辑 彭勃】